



刘鸿伏

廖静仁的写作,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为第一阶段。他以小学四年级的学历与农民加篾匠的身份横空出世于群雄并起的文坛,扬名立万散文江湖,有横扫千军的霸悍之气。其时,评论界惊呼:资江边出了个高尔基!这个阶段的廖静仁,是散文家的身份。不过,这一阶段他有过较长时间的写作潜时期,几乎从读者的视野消失。

第二阶段在近十年或者不到十年吧,他忽然毫无征兆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龙船鼓响,复又站在那一条伟大而又激荡的文学河流之上,以每年发表十几部中短篇小说的战绩,再一次刮起廖旋风。案头这部煌煌86万字的《门虚掩》,是他除了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之外的中短篇集结,足以证明其惊人的创作激情与创造力。因此,这个阶段的廖静仁,在潜水又出水之际,倏忽就完成了由散文家向小说家的华丽转身。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资水船歌》开始,到后来一批影响力广泛的作品,如《斯文摆渡》《觅乡贤》《寻找乐正子》《门虚掩》等等,虽然一如既往地围绕资江流域生发的人与事这个主打乡土题材来写作,但作为小说家的廖静仁,却是野心勃勃地用全部心力和才思建构他理想中的文学资江,正如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一样。当年他的散文写作也即乡土的资江却并非出于文化的自觉,而只属于自然而然的、近乎原生态的写作,但他的小说创作,则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的自觉了。

不同的追求与不同的文本,负载的是作家不同的创作理想。应该说,廖静仁成名于资水题材的散文,现在又以小说再一次打开乡土的大门,这是一种长久的坚持与执念,是他对这片胞衣之地的无比眷恋与追索,几十年风云巨变,唯独不变的是他文学的初心。

散文家廖静仁与小说家廖静仁的相同之处,是他永远接地气并永远关注底层乡土社会,而两种不同的文体在他手上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他的小说创作期,是以新乡贤的身份回归原居地,出发与回归,都在同一个点和面。这是形而下。从资江的山野走出去与从红尘喧闹中归来,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以一种迥异于当年的全新的感受与思考,对陌生又熟悉的田园、村舍、青山、流水以及已逝或亲历的人与事,进行理性的梳爬与深入,从而抵达乡土最动人的也最隐秘的敏感点,抵达各色人物命运的内核,找到原汁原味的隐藏于平常岁月的温暖,一如母腹子宫中的那种温暖。然后用笔把这一切碎片化的影像还原或重新塑造成自己心中的完美整体。这就是他正在做或想要做的建造一个只属于廖静仁的文学的乡土资江,一个有可能也是属于文学史或地方志的文学的乡土资江。这已是形而上了。

在他的笔下,故事与人物,有一种穿透的力量和哲学的思辨与社会学的拷问。如《斯文摆渡》这部小说,廖斯文一生渡人也渡己,无论是在村学,还是在出没烟波的孤独渡船上。乡土社会的文脉与人性的坚韧,命运的曲里拐弯与整部作品的隐喻与象征意味,都足以见出作家对乡土文学的独到视角与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

廖静仁是独特的,因为乡土才是他的精神家园,也是他灵魂的归宿。他原本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与他的资江以及资江边的田园本就已浑然一体。很多小说中的人与事,都是真实的存在,不需要去找寻原型。正因如此,廖静仁的小说,便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鲜活的生命力。廖静仁的小说,节奏不疾不徐,元气充盈,思辨深邃,技法上多留白处,如中国画的飞白。他小说中营构的乡土即是私密的、个性化的,也是民族的,他隐身其中时,是平视甚至仰视的角度,有时他是农民的廖静仁;但他也会常常俯视他的乡土,俯视他心心念念的那条浩荡长河,此时他便是作家的廖静仁。作为廖静仁的同乡兄弟与最密切的友友,我遥望未来,心里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乡土,永远是一扇虚掩的门。
《门虚掩》廖静仁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有删节。)

一部有担当、有价值的长篇小说

田中影像

汪家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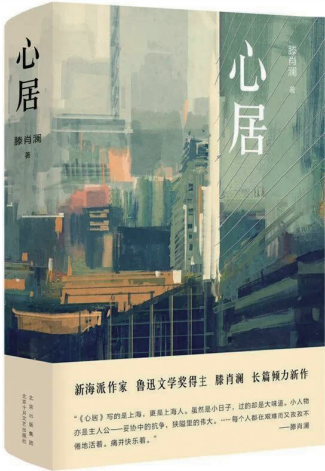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照相史——读《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心里忽地蹦出这样一句话。人有爱好，并能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发挥这爱好，是愉快的事。我多年从事与影像有关的工作，直到编辑出版《老照片》，算是大大过了一把瘾；并因之结交了许多摄影人。其中，晋永权是我知道得比较早、相识却比较晚的一位特别的影像专家。2006年，我在三联书店工作，他的《出三峡记》在我店出版。书中以文字和影像并行的形式，力图通过记录和展示一个个三峡移民和家庭相同又不同的经历，把整个大迁徙立体地呈现出来。从此我记住了晋永权。

说他特别，是因为从书中看，他与我以往了解的大多数摄影人不同。比如，面对影像，喜欢胡思乱想，还有些多愁善感。他不是技术型的摄影匠，也不是以忠实记录社会和历史为最高追求的摄影家，而是一位身在摄影中又在摄影之外的研究者。他总是跨界，把影像学与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联系起来分析、考证，发掘出与影像有关却又超出影像的新角度、新思维。

几年之后，晋永权推出了新作《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的中国摄影争辩》，书名红底黄字，上面一行小字写着：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

从2006年，到2009年，再到2018年，

田马观书



《心居》 滕肖澜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命成 胡诗奂

《青枫记》是胡小平历时三年、精心打磨的长篇小说新作,是中国作协2019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获湖南省“梦圆2020”主题征文长篇小说二等奖。日前,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阅读俱乐部在新华书店旗下之长沙乐之书举办了《青枫记》新书品鉴会。该书作者胡小平与专家学者、读者共同品读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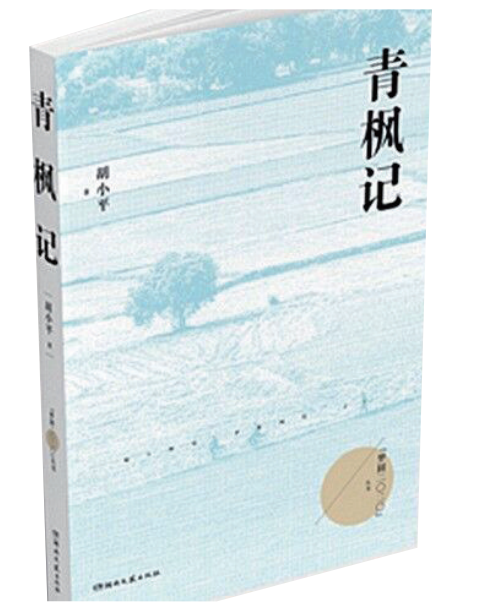
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在贺信中说:“近年来,小平创作井喷,作品迭出,不仅在金融领域有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成了湖南较为活跃的作家之一。《青枫记》在出版之后的三个月里,已销售逾万册,可喜可贺。这充分说明《青枫记》是一部接地气、合时代,故事性足、可读性强,有担当、有价值的优秀长篇小说。”

中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在贺信中写道:“《青枫记》被誉为雪峰山下的‘创业史’,湖南西部的‘山乡巨变’,是一部主题鲜明、思想深刻、视角独特、内容丰富、结构精巧、人物鲜活的佳作。近年来,胡小平创作活跃,佳作不断,已走出了金融,融入了社会,得到了金融人的喜欢,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倪晴、周泽民、胡诗奂三位朗读了《青枫记》中的精彩片段。胡小平畅谈了《青枫记》的创作背景,与在座读者分析探讨了书中的精彩细节。

湖南省作协组织部副主任贺秋菊介绍了湖南省“梦圆2020”主题征文及丛书出版过程,介绍了胡小平近年来的创作成果及《青枫记》获奖情况等。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马笑泉说:“《青枫记》这本书表达了中国很多年来,知识精英如何反哺美丽但又贫穷的故乡这一命题,并巧妙地把这个命题和现在的扶贫攻坚结合在一起,是传统跟现代的融合,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新时代下的一个新的表征,这就使得《青枫记》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不是一部应时之作,而是表达了一个中国几百年来、上千年来,知识精英们一直在探索着的一个命题。这也是《青枫记》的价值和意义。”“一旦胡小平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故乡,他那个笔触立刻就变得活跃起来,那个情感就立刻变得温润深沉起来……诗意的东西就出来了,那种情感就自然流露出来了,所以他把这个题材和他这个视角,把他的精气神,聚集雪峰山脚下那是绝对明智的,也保证了这部作品的文学



品质。”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龚旭东说:“小平是个非常勤奋的作家,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热爱的写作上,能够几十年保持自己的这种精神追求,非常不容易。每天工作忙完,回去还认真真写作,写了一遍,不满意再修改,这一点没有那个精神是做不到的。他用真心和真情去写作,把真心和真情融入作品,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与这有很大的关系。”“《青枫记》不仅是扶贫题材小说创作的成果,也是近年来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成果。书中人物大多塑造得血肉丰满,有着丰富的人物个性,从贫困户的表层的生活变化到贫困户的内心精神变化,将精准扶贫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完全可以这样说,赵小宝是扶贫题材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真正能立得起来的人物,是对扶贫文学的重要贡献。”

《芙蓉》杂志编辑部主任杨晓澜说:“《青枫记》的故事和人物都写得很好。故事很感人,人物很动人。一般扶贫题材的作品,人物写得飘,写得虚,而胡小平贴着人物去写,把人物写活了,写好了。一个作品,你是否留得住,是否让人读,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人物是否立得住。”“作为编辑,作为普通读者,我觉得,是那些真实的人物打动了我,那些细腻的句子打动了我,还有主人公朴素的情怀打动了我。归根到底,还是胡小平自己有感而发,是对雪峰山这片土地和自己的这个村庄爱得深沉。看得出来这种情感多年以来一直蕴藏在他心中,也是这种情感打动了我。”



这本书是十年前那本书(《红旗照相馆》)的姊妹篇,探讨的话题十分不同,又十分相关,对照阅读可对理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摄影(照相)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形成的关系,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

的确,在《佚名照》中我看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力劳动者到文化人,从平民到军人,从男人到女人,从孩童到老人,从50年代到80年代……完全不同的芸芸众生,在对照相机时,却表现出非常一致的东西:时代之色,时代之光,以及表演性、模仿性、符号性。表现什么?追慕什么?什么符号?单用词语说不清楚。晋永权通过对成百上千的照片分类和比对(互文性)得出多层次、有见地的答案,堪称一部中国百姓照相史稿。

《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晋永权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节。)

读有所得
聂茂 李馨然

湘俗民情下的生命交响与人性表达

湘景民俗：
湘土地方特色的彰显与记录

湘土地方特色是阿良小说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在《远方有诗》收录的小说中,阿良描绘了大量湖南人民的传统风俗与文化,而正是这些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风俗与文化典制,联结成了作者笔下的湖湘风景民俗图,勾连起了作者所叙述的人与事,建构了小说人物情节的深层次文化背景,这也是小说文化根性与道德价值的建构。

如《远方有诗》作品集第一篇小说《羹砵羹》,便向读者展开了一幅湖南农村每逢冬至时的美食制作画面,以“羹砵羹”为线索穿插回忆了女主人公叶小惠少女时代及婚后的四个生活片段,展现了湘湖农村人民淳朴善良、勤劳孝顺的美好品质。

阿良在湖湘风俗的地方性背景上,搭建起了故事的文化背景,从而描述了许多极具湖湘色彩的人生故事,从中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对于人生诸多喜悦与苦难况味的感悟。如《羹砵羹》是农村留守妇女与在外务工人员家庭团聚的联结,《暖寿酒》是农村望族长辈对子孙的人生训诫。这些湖湘文化民俗在阿良小说故事的烘托下,因为有了“主体”的参与迸发出了它们原始的文化生命内涵,体现出了湖湘文化的人际空间与精神内核。

民情人事：
乡村与城镇的人生交响

从叙事对象来说,阿良笔下文本叙事空间是宽阔的,无论是湖湘的农村山野,还是乡镇的街道集市,抑或是城市的社区楼阁,都是阿良小说创作的空间对象。除此外,阿良还关注到了农村在外务工人员。如《羹砵羹》中,叶小惠作为农村留守妇女独自面对家庭重任与世俗诱惑的双重挑战,最终捍卫了自我的道德底线与丈夫团圆。

除农民外,阿良还通过塑造深入农村的基层干部的形象,侧面反映了湖湘农村中的具体矛盾。在《远方有诗》中,江远诗作为一名从城镇调入农村做扶贫工作的支部书记,以生命为代价书写了扶贫攻坚的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同时也从江支书的工作中侧面反映了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众多矛盾。

小说集中另一类是以城镇为生活背景反映的民情人事,阿良在这一类题材中将目光注视到城镇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如《小巷“芝麻官”》中的卫池莲是一名社区办事员,每天面对社区中的众多繁琐工作。阿良在这其中不仅讲述了社区基层干部工作的人际关系与工作方法,更揭示了社区基层工作中部分领导不顾实际情况不解决问题的“形式主义”工作作风。

人性表达：
道德伦理秩序的坚守与溃散

从表现人性的真善美层面来看,最为显著的是《羹砵羹》,作者塑造的叶小惠这一女主人公的形象,叶小惠作为农村留守妇女,有着许多中华传统美德的美好品质,加之作者对其他人物形象所赋予的高尚品质,如树林老师、树林老师爱人、奶奶、石杞等,因此整个故事呈现出脱离世事的理想状态,偏向于作者理想化的、纯粹性的乡土情怀作品。

而从表现人性的假丑恶来看,作者阿良通过描写城镇与乡村人物的品质丧失,表现出了对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秩序破坏和泯灭的扼腕与叹息。在《骡驴子的后事》一文中,骡驴子的两个儿子在城镇当官后,当他们开车轧死村民的鸡时,“丢下二百元溜烟跑了”,当要出钱给村里修路时,他们竟以国家代表他们出钱为由不捐献一分钱给乡镇,导致父亲骡驴子的邻里关系越来越差,最终两个儿子因贪污坐牢,父亲的后事无人安排。

总的来说,《远方有诗》这部小说作品集,充满了湖湘人情美和人文乡土情怀,以及对中华朴素道德伦理秩序的思辨与映射。

《远方有诗》阿良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